

儒家思想在中国与东亚发展之比较

张 灿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政治系 云南 蒙自 661100)

【内容摘要】儒家思想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出现了地域上的差异。在整个东亚,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儒家思想在发展与流变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态,对中国和整个东亚的儒家思想进行比较与分析既有利于继续发扬儒家思想中与现代化相契合的精神,使之能进一步在东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借鉴儒家思想在东亚其它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与发展,更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关键词】儒家思想 中国 东亚 比较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9-0090-05

儒家思想虽发端于中国的秦朝,但经过后来的儒家学者的演绎、阐释,有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形态。同样儒家思想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出现了地域上的差异。所以在整个东亚,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儒家思想在发展与流变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态,而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也由于本土文化的不同、传入的时期不同、所经历的历史变化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儒家思想尽管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显现出了各自的特点和差异,但是有些核心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而正是这些共同的价值观所起的巨大作用,促进了整个东亚经济的腾飞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同样,也正是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差异,使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的文化机制在历史发展中,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也大相径庭。正因如此,现在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状况、现代化程度也显示出很大的不同。

一、中国儒家思想与东亚儒家思想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儒家思想在各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但儒家思想核心的价值观是普遍的稳定的,而且在

每个国家都很好地保存下来了,现在仍在这些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这些共同的价值观明确地划分了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范围,显示东亚文化圈共同的文化特色,这些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东亚价值观,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1.天人和谐的价值观

天人和谐的价值观认为,人类与自然界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人与自然不应该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为了保证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人类不应该过分地向自然界索取。西方世界在发展经济时,就正是以征服自然为出发点,对物质世界形成了一种掠夺式的竞争,从而造成了今天全球环境恶化。而东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了西方的覆辙。东亚的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要避免人类在自然的报复中最终走向灭亡,就应该以儒家思想中天人和谐的观念为指导,时时把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放在首位,保证自然界的良性循环,保护和维持生态平衡。

2.以人为本的伦理观

人际关系的核心就是“仁”,强调爱人,是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精要所在,它要使个体与群体、与他人形成亲善的关系,最终能够形成安定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它强调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有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因而任何个体

* 作者简介:张灿(1979-),女,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政治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研究。

都只能安身于社会群体之间,而不能孤立存在,所以个体必须服从群体利益,以群体价值为唯一取向。这一重要思想在日、韩的企业经营模式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了,甚至已经是东亚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了。

围绕人与自身思想,儒家思想特别彰显人的主体精神,重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儒家思想人之为人就是在于人的道德主体性,所以人如何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尊严,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就成为儒家思想关心的焦点,于是儒家思想就塑造了一种具有理想人格的圣人形象,把他作为个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在今天东亚许多国家的在思想教育中,提倡把圣贤作为理想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目标,鼓励个人加强道德修养,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

3.德治、仁政的政治观

强调秩序与稳定,是儒家思想中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因为社会秩序的相对和谐与稳定,是一个社会获得发展的基本保证。这一政治理想指出,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不应依靠刑政,而应以道德教化为主,同时也必须施民以实际利益,使他们可以丰衣足食,这样才能安居乐业,从而取信于民。除了物质利益以外,统治者还应施民以情感,把整个社会笼罩在一个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缩影为一个以情感为纽带的大家庭,受此影响,东亚许多国家历来都很重视通过建立廉洁高效、亲民爱民的政府来培养人民的高度自觉,形成强大民族凝聚力。另外,这一政治理想还对统治者本身的道德修养也提出了要求,即统治者必须是道德的楷模,使人民心悦诚服,从而使自己成为众望之所归,于是统治者的德性主体也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因此在东亚许多国家非常尊重权威,注重统治者个人魅力,并以此作为统治者合法权力的根据。

4.“有教无类”的教育观

教育在儒家思想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儒家历来把教化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④。

孔子最早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这是最早的教育平等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沉闷局面,使得更多的平民有机会接受教育;同时也扩大了教育本身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密切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教育本身具有了更大的实际价值能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在教育的内容方面,孔子更是提出教书和育

人同等重要,要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等多方面均得到全面发展。所以在东亚许多国家,无论是在国家政策导向还是在经费投资方面都对教育进行积极的支持,同时广大的国民也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甚至把此作为家庭生活的中心。

二、中国儒家思想与东亚儒家思想的区别

从儒家思想的产生而言,中国儒家思想具有原发内生性而东亚儒家思想具有后发外生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是世界几大原生文明之一,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无数辉煌的文明成果,成为了影响东亚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文化发源地。而儒家思想正是中国所创造的重要的文明成果之一。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形态,儒家思想是经济和政治的观念性反映,也就是说正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孕育并催生了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儒家思想。中国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于小农经济的生长发育,因此从公元前5至7百年间,就发生了封建领主—农奴经济向地主—小农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而后这种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又正是这种地主—小农经济调整和完善了经夏、商、周三代建立起来的宗法家族制度。而这种以宗法家族制度为单位的分散的各自经营的小农经济由于自身的不足而需要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以保障他们的安全,以救济天灾人祸、兴修水利工程、调节社会纠纷、抵御外来入侵,最终维持社会稳定,于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主义应运而生。如同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制度与小农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样,儒家思想天生就是为统一的皇权制度服务的,虽然专制皇权从一开始曾经选择过法家学说、黄老之术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统治者终于认识到儒家思想才是唯一适应中央皇权专制的文化,从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具有国教地位,尤其到宋以后,独占鳌头,将中国的大一统文化发展到了顶峰,使中国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集权制达到了完善的境地。因此,从本质上说,儒家思想当中最主要的、最根本和基础的东西是中国特有的家族制度和社会组织中产生出来的,即是以农业社会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为根基的。而在东亚,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高地,几千年来在整个东亚乃至世界都保持着其文化的先进地位,是输出文明地主要国家之一。因而东亚的其它国家仰视着其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难免心生向往之意,于是就

大量地引入中国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作为中央天朝大国文明结晶的儒家思想自然也就向东亚各国辐射、渗透并与当地的文化碰撞、冲击、融合,成为了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就形成了中国儒家思想与东亚儒家思想原发内生性和后发外生性的区别。正是这一最初形成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后来发展过程中中国和东亚儒家思想在面对自身变革、外来文化挑战的不同反映,而笔者在接下来要分析的区别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之展开的。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标志,只有在与外部民族的文化碰撞与不断的冲击和融合过程中才可以得到发展。但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同时具有传播性与稳定性,因为具有传播性,所以才会有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一种文化可以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从而不断更新、进步。但是如果文化不具有稳定性的话,本土文化将失去选择和处理异质文化的能力,对外来文化全盘吸收,最终完全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不再成其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因此,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至关重要。

中国的儒家思想由于具有原发性与内生性,因而是一种单一自创性文化,这种类型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具有保守性,容易沿着自身脉络去发展与创造,虽然也会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但对文化本身缺乏冷静的反思,往往不会有意识地与异质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再加上,中国儒家思想变革持有一种审慎、保留甚至是反对的态度,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9]的原则,这种保守的文化取向导致中国社会僵化、呆板、发展进程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所以在近代,面对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时,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敢于接受和采纳西方文化中的新因素,但始终没有勇气超越传统,在思想情感上仍然与传统儒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中国的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比较保守,不容易迅速地认识、接受并吸收外来文化。而东亚各国由于一开始就是作为文化接受国的地位,因此对外来先进文化的辐射,一般都易于吸收,能够以更博大的胸怀去理解和接受外来文化,所以到了近代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之时,他们就能以更开放的心态和更积极的态度去理解和接受这种新的外来文化。因而对于他们而言,西方文化同中国来的儒家思想一样都是更先进的文化,这种学习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社会

的进步。由于儒家思想在东亚并没有原创性,他们在接受新的西方文化时就不会像中国一样有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们不会有失去文化霸主地位的失落感,更不会有抛弃原创文化的负罪感。所以在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表现了一种保守性,而东亚更多的却体现了开放性,能够更加虚心地学习外来文明,“他们不因顾及到空虚的面子而拒绝模仿外国文化的事物,保全面子的要求阻挡不住他们模仿外国文化的要求”^[9]。而且无论是接受任何异质文化,东亚国家一般都不会全盘照搬,都要进行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改造,同时注意同本土文化的融合,从而保证文化的本土特色。比如,中国儒家思想在韩国就进行了两次较好的改造,一次是实学思想,一次是开化思想。而日本善于学习改造外来先进文明为我所用则更是世界皆知。

中国儒家思想的原发性还体现在它具有强烈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历史上,中国居于东亚国际关系册封体制的中心,使它在文化上具有相当的优越感,甚至近代有些思想家仍然认为“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4]。政治上的唯我独尊性也折射到了文化上,中国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就表现出了强烈的独尊性和排他性。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是具有一定的兼容并包精神的,否则中国不可能形成一种三教合流的文化局面,但是儒家思想在吸收任何一种新的文化的因素时,摆出居高临下的态度,而且吸收的原则是只能为“用”,决不变“体”,核心的价值观念无论良莠坚决不变。所以在这种华夷观念和“体”不变原则的指导之下,中国儒家思想一开始面对西方文明时就是表现出一种蔑视的态度,从而产生的是一种强烈的排斥反应。对西方近代文明所具有的科学技术、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核心价值显得极其不适应,认为西方文明只不过是“奇巧淫技”。所以后来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儒家思想都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势俯视西方文化,不承认甚至没有意识到西方文化和中国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互相借鉴,共同进步。而相对而言,儒家思想在东亚本身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更多的是“用”而不是“体”。例如,儒家思想到了日本之后,是由日本人按需所用的,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取得主流文化地位,只是作为贵族阶级的教养,在上层社会有限地传播,到后来因为一定的政治斗争需要曾经获得过独尊地位,很快又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批判的对象。正因如此,儒家思想在日

本等东亚国家的发展并未能成为其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障碍,使得东亚国家可以把儒家思想和西方现代文明融合后,经过选择、淘汰、消化加上坚持传统的理性中和,形成东亚独特的文化,并能顺利使文化转型,促进现代化的发展。

三、东亚儒家思想发展对中国儒家思想发展的启示

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内,日、韩等国家显然已经在儒家思想现代化转换与发展的路上获得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些经验和成就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为我们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的儒家思想这历史性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要对儒家思想本身有一个客观的全面的认识。儒家思想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此从感情出发,在很多时候很难做到对儒家思想的客观正确的认识。

但是要对儒家思想进行适合于现代社会的改造,对它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是起码的前提。因此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对它进行正确的认识与评价,一是它的内容,儒家思想有自己完整的一套道德修养的理论,在提高个人精神境界,调整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建设社会精神文明方面确实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它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仍然得到中华民族大多数人所认可,并体现在日常的思想行为中。但它也有一些糟粕部分,作为封建社会的思想遗毒,在今天仍然在社会中有一定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绊脚石。二是它的历史地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时代的产物,是应封建专制制度的要求而生的,它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在整合社会、安定人心、维护皇权至上、中央集权的制度方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但它毕竟不能永恒地适应一切时代的需要,随着其所依附的封建帝国政治制度的衰落,它也失去了政治支撑,而不得不退出历史的舞台,在当今社会它已经不能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来指导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了。

第二,在正确全面认识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必须经过批判否定的阶段,使其进行现代性转换。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在发挥作用的。一方面,他通过影响上层文化,在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中发挥影

响,最终上升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通过影响下层文化在民众中传播,最终形成社会的风俗习惯,以“乡规”、“民约”或言传身教等形式流传。而且二者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最终罗织成了一个大网,将整个社会纳入其中,从而使儒家思想能够牢牢占据文化的主流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主体文化。到了近代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西方殖民国家挟强势武力的入侵,儒家思想也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从洋务派到维新派都提出必须适当地吸收西方文化以改良中国文化,但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维新仁学”都认为即使是要近代化,也必须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进行。因而没有最终否定儒家思想的文化主体地位,只是提出不同程度的改良而已。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儒家思想完全作为了被批判的对象,遭到全面的批评和否定,但这种批判主要还是限于学术上,而没有真正在全社会形成这样的思潮。要对儒家思想进行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不但要有思想的批判,对其思想内容的精华和糟粕进行分析和扬弃;而且必须割断它与封建的宗法等级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君主专制制度的联系,变换机制,转变职能,把自身的基础转移到现代社会的社会基础上来。只有经过了这一彻底否定过程,对儒家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现代化转换才有可能性。

第三,在正确处理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有中国特色现代化转换。

日本与韩国正是在成功地处理儒家思想和本土文化,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有本国特色的现代性转换的基础上,才能使儒家思想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成为东亚现代化模式的重要文化标志。因此中国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转换也既要处理好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又要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在处理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关系时,首先要注意保持它的独立性。中国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一种民族精神,在今天依旧要保持它,这样才能保持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使我们的民族性有安身立命之所,使中国文明不至于断裂。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儒家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和独尊性确实严重阻碍了它自身的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一定要以现实合理(下转第106页)

红军队伍迅速扩大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红七军于1930年7月在恩隆县平马镇成立教导大队并进行训练学习,主要培养连、排基层干部,共有学员100多人,时间为3个月,邓小平、张云逸亲自参加开学典礼并作了报告。

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学习和教育,使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得到很大提高,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一般同志革命情绪甚高,对革命前途抱乐观”。^{[1][P367]}而军队中“一般士兵觉悟也相当高,党的工作也建立了相当基础,各支部能经常开会,讨论问题,分配工作,党内政治觉悟也提高了。”^{[1][P373]}党员、干部、战士树立起远大革命理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红七军和苏维埃政府中,形成了良好的工作、生活作风和风气,腐化现象、官僚作风自然就逐步减少和消除。

五、加强宣传,注重教育

百色起义期间,为了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反腐斗争,促进广大党员、官兵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自觉抵制腐化、官僚化现象,邓小平十分重视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把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纳入前委整个政治宣传工作之中。当时的反腐宣传教育主要是通过张贴标语、开识字班、举行士兵会、唱革命歌曲、政治讲堂、个别谈话、率领士兵到街道和农村向工农宣传等方式去进行。例如当时张贴的标语有:“红军官兵待遇平等”、“红军最有纪律:一不拉夫不发洋财,二不强买强卖”、“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肃清苏维埃委员豪绅化官僚化”、“肃清一切腐化动摇分子”、“必办不遵守革命纪律的分子”等等。识字班所用的《工农兵识字课本》编有下列内容:“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志愿军,不是雇佣军队。红军官兵,待遇平等,废除肉刑,不打士兵。士兵委员会,维持军纪军风,保护士兵权利。士兵对官长,行动上监督,士兵对民众,亲爱如手足,士兵要严遵军纪,不发洋财不赌钱。苏维埃是最革命的政府,与反革命国民党政府不同,要反对腐化、官僚化,要选出很革命的贫苦工农分子来当苏维埃委员,不准剥削者、压迫者来参加苏维埃政府”。^[4]为了使红七军纪律深入人心,右江根据地军民普遍流行唱的《红军纪律歌》,它的歌词是:“红军纪律十分的严明,凡我同志都要记

清,这是我军主要的生命,沿着革命前途飞进,我们都是工农出身,工农痛苦知道最深,工农的东西来得不易,一草一木不得损害,没收豪绅地主的的东西,不得自己贪污归私,服从指挥上交给养队,遵照规章统一处理;红军处处爱护群众,莫把群众利益损害,若要发洋财即是反革命,严重处分不得留情;为要发挥红七军的强威,一切行动要听指挥,上级的命令下级要服从,不论官兵不得违背,无论战争时平时与行军,爱护群众保卫工农,力量真强大打得敌人怕,中国革命才得成功。”^[4]

通过上述多种方式的宣传教育,反对贪污腐化、官僚化和豪绅化,坚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观念渐渐深入广大党员、士兵、苏维埃工作人员、赤卫军队员和人民群众脑海中。在革命队伍里、在根据地内,形成一种反腐倡廉的社会风气,使腐化现象、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化、豪绅化现象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从而使广大党员、干部逐步做到自觉遵守革命纪律、防腐拒变。

百色起义期间,邓小平领导右江革命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反腐倡廉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较早的反腐倡廉活动。它纯洁了革命队伍,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保证百色起义的胜利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发展。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反腐倡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小康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写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 [2]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百色起义史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4.
- [3]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邓小平与百色起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579.
- [4]左右江革命史调查组.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二辑[Z].1978.

(上接第93页)的态度取舍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文明相呼应和相排斥的部分,既继承和发扬了自身文明中的精华部分,又使之同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部分合理地接轨与融合。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儒家思想既能保持其内在连续性又能保证其持续发展性,焕发新的生命力和活力。另外,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现代性转换,一定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客观地认识、批判它,把它的精华的核心价值融入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中,既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

深厚的历史积淀,保持民族性与独特性,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使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的儒家思想经过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转换后在新时期能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 [1]孟子.尽心上
- [2]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三
- [3]殷海光.中国现代化的问题[A].罗荣渠.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4]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A].清议报全编,1980,第4册.